



司马迁与 《史记》论集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司马迁与《史记》论集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编辑说明

本丛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杂志社为总结建国三十年来历史研究上的主要成果，整理史学领域内的重大争论，推动学术进展和促进文化繁荣而编辑的。丛书按专题分册，选录各该专题的代表性论文，附以论著目录索引，并做出综合述评或简单说明。述评力求公正客观，目录力求全面系统，选文力争反映出研究面貌和水平。

本丛书由国内主要出版社分别出版，适合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及高等学校文科师生阅读。

司马迁与《史记》论集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75,500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统一书号：11094·77 定价：0.77元

前 言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开创了我国的历史学；他写的《史记》是我国古代不朽的历史著作，奠定了我国史学的基础，秦汉时代社会发展和天下一统的形势，家世史官和父亲遗嘱的影响，以及历史和现实的见闻感受，促使司马迁提起如椽大笔，“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写成了一部誉满中外的历史巨著——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的《史记》。司马迁与《史记》给中华民族文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那纪传体例的创始，“实录”、批判的精神，历史纵横的贯通，中外兼观的卓识，人物特写的传神，战争描述的生动；以及“述往事，思来者”的思想，皆随着我国历史源远流长，促使我国史学长足发展。

二千年来，各个时期都有一些学者对司马迁与《史记》进行研究和评论，积累了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只有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学者才逐步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司马迁与《史记》重新研究和评论，发表了不少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著，取得了空前的研究成绩。近三十年来，仅见于我国大陆各种报刊的有关论文，就有一百数十篇之多。

研究司马迁与《史记》，不仅对于了解史学的历史，而且对于发展现代的史学，都有一定的意义。因此，今后还应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不过，现在有必要考虑一些新的问题，提出一些新的专题，采用一些新的办法，进行新的探讨，诸如将司马

迁与《史记》同其他史家史书进行比较研究，将二千年来研究司马迁与《史记》的资料进行分析和整理，对国外学者研究司马迁与《史记》的情况进行了解和介绍，等等，以期取得新的更大的成果，促使现代史学的发展。

我们这里从建国三十年来（1949年至1979年）发表的有关论文中，选择较为重要的较有代表性的十五篇，编成这个集子，提供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爱好者和研究者作参考之用。本集所收论文的编排，按其内容先分为六组（有的文章内容既广且多，只能暂据其侧重面约略区分）；每组内的文章，则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这十五篇文章，因见于不同时间的各种报刊，存在字体繁简、标点符号、引文注释、体例格式等不大一致的现象，我们编辑时酌情做了些统一的工作。

对于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近年来又有些新的论文发表，将来更可能有新的进展。我们想，为时不久，还将编辑司马迁与《史记》的新论集。

编者

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目 次

前言	(1)
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	翦伯赞 (1)
《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 学上的地位	齐思和 (7)
司马迁与班固	白寿彝 (16)
司马迁生平及其在历史学上的伟大贡献	郑鹤声 (34)
论司马迁及其历史编纂学	卢南乔 (70)
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	侯外庐 (97)
司马迁的哲学思想	任继愈 (105)
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及其阶级性	陈可青 (119)
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	白寿彝 (136)
司马迁写当代史	施 丁 (156)
《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	郭沫若 (182)
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	李长之 (187)
从“十岁诵古文”商榷司马迁生年	程金造 (192)

太史公书名考	陈 直 (208)
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	陈 直 (215)
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文目次	(243)

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

翦伯赞

司马迁的名字和中国历史学是分不开的，因为由于他的天才的创造，中国的历史学才第一次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

司马迁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左冯翊夏阳地方（今陕西韩城县南）一个世族的家庭。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史官，精通天文历数和黄老之学，是一位博学的史学家。

司马迁曾经有过快乐的童年。在那时，他和他邻近的儿童一样，在他可爱的故乡放牧牛羊。但这样的时期，很快就过去了。十岁时，他父亲为了训练一个能够继承他事业的儿子，就要他整天地在一间书房里读书，在那里他读了十年古文。

在这十年中，他从书本上获得了不少的知识，也积累了许多不是从书本上所能解决的疑问。为了解决这些疑问，就迫使他去作实地考察。二十岁时，他终于走出书房，开始游历的生活。他到过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过淮阴，访问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萧何、曹参、樊哙的故宅；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访

问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访问孔子、孟子的故乡；此外，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他就在这样的游历中，把他十年来积累下来的疑问，完全去掉了。

正当这位年青的历史学家漫游中国作访古旅行的时候，中国的商人地主却在积极准备为了中国丝织物的销路，而打开通达中央亚细亚的国际道路。当时汉武帝从张骞的报告中，知道了通达中央亚细亚，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从新疆越过帕米尔高原，另一条是从云南经由印度。因此汉武帝就想打通这两条道路。

不久，在长安城中，吹响了远征军的号角，而司马迁就出现为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的先锋。但他遭遇到西南夷人的抵抗，没有完成他的政治任务，就回到长安了。

司马迁回到长安时，他的父亲正病倒洛阳，生病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参加汉武帝封泰山的典礼。在当时，参加这种典礼是一种光荣；不能参加是一种耻辱。司马迁赶到洛阳，他父亲已在垂危之中，不久就死了。唯一的遗嘱，就是要司马迁完成他的著作。

汉代的史官是世袭的。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继任为太史。以后，他就把写作历史当作他父亲的遗嘱而执行。他在皇家图书馆，整整搜集了五年的资料，才写定了他的著作纲领。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便开始写著他的不朽的名著《史记》。

平静的著述生活，不过五年，灾难就从天上飞来。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遭到李陵投降匈奴案子的牵连，受了腐刑。

假如司马迁有钱，也可以赎罪，但他家贫；假如有人替他

向汉武帝解释，也许可以减罪，但他的亲戚朋友不为一言；因此，他的命运是决定了。当受刑之前，他也曾想自杀，但一想到他的著作尚未完成，就毫无愠色地忍受酷刑。

自从遭受腐刑以后，司马迁不但肉体变成了残废，精神也受到了最大的摧残。他往往“居则若有所忘，出则不知所之”，简直有些神经错乱的现象。但为了完成他的不朽的著作，他镇静下来，发愤著书，以至于死。

二

司马迁唯一的著作是《史记》。这部书，上起传说时代的五帝，下迄汉武帝。全书一百三十篇，其中本纪十二篇，书八篇，表十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自从有了这部书，西汉以前的古史，才第一次放出光明。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这大概是没有否认的。不过司马迁的不朽，不仅因为他写成了一本《史记》，特别是因为他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学方法，即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

所谓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就是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学方法。这种方法是将每一个他认为足以特征某一历史时代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归纳到他自己的名字下面，替他写成一篇传记。这些人物传记，分开来看，每一篇都可以独立；合起来看，又可显示某一历史时代的全部的社会内容。《史记》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学方法写成的。

在纪传中，又分本纪、世家与列传。本纪记皇帝；世家记贵族；列传记官僚士大夫。虽作为主题的人物政治地位不同，

但以人物为记事的主体，则是相同的。

本纪和世家、列传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本纪虽亦以人物为标题，但并不是传记体，而是编年体。所谓编年体，即将某一皇帝时代所发生的史实，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依次记录。实际上，本纪就是世家与列传的纲目，而世家与列传则是本纪的注文。

例如《汉书》记李陵投降匈奴事，《武帝纪》中只说：“天汉二年五月骑都尉李陵，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与单于战，斩首虏万余级，陵兵败，降匈奴。”而在《李陵传》中，则详述李陵和匈奴作战以及他投降的经过。

除纪传以外，有书有表。书的内容，是总述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人物列传的总序。表是排比史事或人物的世次或年代，可以说是人物列传的附录。但书表在《史记》全书中所占的篇幅是很少的。例如在《史记》一百三十篇中，本纪、世家、列传共占一百一十二篇，书、表合计只有十八篇。

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在今天看来，当然已经陈旧，而且有很多缺点；但在两千年前，司马迁能开创这样一种历史学的方法，是值得赞叹的。

司马迁不朽，不仅由于他开创了这种历史学的方法，而且在于他具有远大的历史见识。他的见识之远大，首先表现在他的眼光能够投射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即以世界规模研究中国历史。例如他在《史记》中，已经注意到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如匈奴、西南夷、东越、南越；并且注意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如朝鲜及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等中央亚细亚诸国。

其次表现于他的眼光能够投射到历史上的社会的每一个侧面。例如他在《史记》中，不仅注意到表面的政治现象，及文化思想宗教等等，而且注意到社会经济的演变，他的有名的《平准书》是后来各代史书的《食货志》（注：是谈社会经济的书）的典范。

最后而又是最重要的，是表现在他能把眼光投射到社会的每一个阶级。例如他在《史记》中，不仅替皇帝写本纪，也替失败的人物项羽写本纪；不仅替贵族写世家，也替地主阶级的“叛逆”陈涉写世家；不仅替官僚地主、商人、学者、艺人写列传，也替下层社会的人物如游侠、刺客、龟策、日者（即占卜的人）等等人物写列传。

司马迁的不朽，不仅由于他具有远大的历史见识，而且又在于他具有大胆的批判精神。他的《史记》，不是一部死板的纪述的历史，而是一部富有灵魂的批判的历史。

从《史记》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司马迁在大胆地进行他的历史批判。他用敏锐的眼光，正义的观察，怀疑的精神，生动的笔致，沉重而动人的言语，纵横古今，褒贬百代。

从《史记》上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不仅批判前朝的皇帝，而且批判本朝的皇帝。例如他评吕后，说她：“政不出房户”；评汉文帝，说“赏太轻，罚太重”。不仅批判本朝皇帝，而且指斥他的当今皇帝。例如他在《平准书》中说汉武帝穷兵黩武，卖官鬻爵；在《封禅书》中说汉武帝迷信神仙，把女儿送给方士以求换取不死之药。在相反的方面，他歌颂项羽，说项羽是近古以来未有的人物。他歌颂陈涉，把陈涉的起义比之于汤武的革命。总之，他敢于指斥帝王，敢于歌颂“叛逆”，敢于揭发历史的黑暗，敢于抨击人类的罪恶。

三

最后，说到司马迁的思想。司马迁的思想显然受到道家的影响，这从他的《史记》自序中可以看出。他在自序中说到诸子百家，甚至对于被当时统治阶级尊为正统的儒家学说，都有批评。唯有对于道家学说赞美尽致。班固批评他，说他思想有问题：因为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所以“是非颇缪于圣人”。用现代语说，就是对历史的看法，有些不合于当时的封建的正统学说，所以他就不能得志于封建皇帝之前。

司马迁因为不满当时封建统治者，敢于批判当时封建的正统学说，也正说明了他的正直。

虽然如此，司马迁的思想究竟要受到时代的限制，不能跳出历史观念论的圈子。例如他说他写《史记》的动机，不仅是为了“通古今之变”，也是为了“究天人之际”。同时他也不能摆脱历史循环论的影响，例如他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不论怎样，司马迁的劳作是不朽的。他所开创的纪传体的方法，两千年来被中国的历史学家奉为正宗。历代以来，凡写著所谓正史都用这种方法。一部二十四史，都是用他的方法写成的。甚至到现在，他的方法还是有用的。象这样天才的历史学家，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史上也是少有的。

（原载《中国青年》1951年总57期）

《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 世界史学上的地位

齐思和

司马迁的伟大历史著作《史记》，不但是中国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且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学上的伟大成就。1955年12月22日苏联学术界在莫斯科举行集会，纪念司马迁诞生两千一百年，这表现着苏联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他们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和一切伟大的著作一样，《史记》的出现是有它的历史条件的。当司马迁从事著作时，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的西汉帝国达到了它最繁盛的时期。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耕种面积的扩大，手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各经济中心间进一步的联系，对外贸易的发展，都标志着汉武帝初年的经济繁荣。在这个基础上，汉封建帝国进一步集中了政权。在对外战争上汉帝国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因而更扩大了汉帝国的经济市场。但是从经济繁荣得到便宜的只是占着统治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富商大贾们，至于在土地兼并、高利盘剥双重压榨下的劳动人民就愈来愈陷于贫困，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到了汉武帝末年，农民起义运动在各地爆发起来。

全国各地间的联系促进了汉帝国进一步的统一，同时在学术思想方面也强烈地反映出来。汉初学术活动的主要特点是综合工作。汉政府对待学术的政策，在武帝以后也是要统一思

想。在汉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便纠集学者编成一部“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淮南子》，这是一部以道家思想观点来总结先秦诸子学说的综合著作。汉武帝认识到儒家思想对于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遂采纳了儒家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的《白虎通义》便是儒家学者关于礼制的一种总结工作。

伟大的司马迁给自己提出了编辑一部通史的任务，也是在这综合、总结工作的气氛之下产生的。这个任务是伟大而艰巨的。在司马迁以前，中国在史学方面虽然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而且已有不少历史著作，如曾经孔子整理过的《春秋》，便是全世界最早的一部编年史。此外，《国语》、《左传》、《战国策》等书都是极重要的历史文献。但是这些著作都只记载着某个时期，或是某些地区的历史，而不是叙述从古到今，包括全面的通史。在汉武帝时这些著作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了。秦汉之际，出现了一部名为《世本》的史书，此书至宋代已经亡佚。从各书所征引的看来，其中有纪、有传、有表、有世系，有作篇以纪事物起源，居篇以纪古地理，内容比较全面，体裁也和以前的史书不同，曾经司马迁参考采用。但它内容十分简单，很象一部类书。到了司马迁才独出心裁，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编写一部“上记轩辕，下至于兹（汉武帝时）”，包括全面的通史。

如果我们充分明了汉初得书的困难，一般儒生的浅陋，我们便可能正确地认识摆在司马迁面前的工作是如何艰难，他的成就是如何伟大。在汉初书籍多半是竹简写的，一部分用绸绢写的，得书十分困难。西汉末年，东平王刘宇以汉帝叔父之尊，要读诸子书和《太史公书》（即《史记》），都弄不到手，一

般人更不用说了。在大学教书的博士们，也只能教授一种经书的一家解释（如《诗经》便有齐、鲁、韩、毛四家的解说），对于其他的书籍，和一般历史知识，都是茫然的。但是伟大的司马迁都几乎尽读了当时所有的书籍。我们试把《史记》中所征引的书名综计一下，便可发现凡是《汉书·艺文志》中所列的司马迁时代以前的书籍，司马迁几乎都引用过了，而且其中有的是《艺文志》中所没有的。司马迁实在是西汉最渊博的学者，是古代的文化巨人。从他知识的广博而论，在古代只有希腊的亚里斯多德能和他相比，虽然他两人研究的范围，注意的对象并不相同。

司马迁所以能有机会运用这样多的史料是和他所受的教育和后来的官守分不开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太史令，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尝著文论六家要旨，也是一个渊博的学者。他已经有编修史书的计划，并且常鼓励司马迁继续他的事业。司马迁十岁就学习古代的文字，掌握读古书的能力，青年时期又从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孔安国等学习经书的解说。司马谈死后，他继任为太史令。太史令是一个职掌天象历算的小官，并掌管宫廷的图书。修史虽不是他的职务，但是由于他保管图书的关系，遂有机会利用“石室、金匱之书”（石室金匱皆当时国家藏书之处）编写他的伟大著作。

司马迁不但掌握了极端丰富的资料，他又是游踪极广的旅行家。他本人是生在陕西韩城县。从《史记》中看来，他西南到过四川的成都、重庆、西昌、汉原，云南的保山、腾冲、顺宁等地；南边到过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东边到过山东，游过曲阜，登过泰山，访过孟尝君的故居；西北到过甘

肃，登过崆峒山；北边到过涿鹿，登过长城，足迹遍中国。到处参观历史古迹，考究民生利病，访问故老传说，和他从书本得来的材料互相印证，这使得他对于伟大的中国自然环境，各地的社会生活，有深刻的认识。

司马迁根据大量的史料，和对于现实生活极为丰富的知识，经过二三十年的辛勤努力，才杰出地完成了这部伟大的著作。这部通史共分五个组成部分。十二个本纪，记述统治王朝与帝王的事迹，夏以前五帝合为一个本纪；三代和秦各有一个本纪，作为全书的纲领。十个表，以表列三代以来世系与年代。自三代以来，许多侯国，同时并存，各有纪年，非常复杂，司马迁列成十个表，统括了错综的年代与区域的发展，这种组织办法，是很方便的。八书以记礼乐制度，天文历法，经济水利。三十世家以记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侯国。七十列传，记述人物，其中有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循吏、儒林、酷吏、游侠、刺客、名医、日者、龟策、商人的传记，还有关于朝鲜、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地区的记载。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这实在是一部组织严密、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也是在公元前二世纪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部通史。

《史记》的出现是中国学术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只有我们把司马迁以前的史学和他以后的史学发展加以比较，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他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

在司马迁以前，我国虽然已经有了《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世本》、《楚汉春秋》等历史著作，但是这些书都被认为是《春秋》一类的书籍，大家是当作经学的一个部门来学习的。汉儒对于《春秋》，又专在“褒贬